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职业足球市场基本规律研究

欧阳勇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体育教学部, 山东 青岛 266580)

**摘 要:**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 职业足球市场与资本主义由投机和债务政治经济主导的寄生状态相当契合, 其本质属性是关于投机和债务的政治经济学。职业足球市场的基本规律主要体现在球员劳动力成本控制、球员工资与议价权、俱乐部社区资产 3 个方面。球员转会交易具有投机性的特征, 而不是确保偿付能力的一种经营方式。职业足球俱乐部是吸引市场投机资本的体育娱乐实体, 市场竞争力将由球员劳动力资本积累产生。作为社区资产的托管人, 俱乐部投资人向球迷做出明确的承诺, 将确保俱乐部比赛成绩放在第一位, 赢得正向的社会价值。

**关 键 词:** 职业足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市场规律

中图分类号: G80-05; G8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1)01-0050-06

## Research on the basic law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marke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OUYANG Yong-qia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ast China), Qingdao 26658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 professional football market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capitalist's parasitic state dominated by speculation and debt politics economy, whose essential attribute is about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peculation and debt. The basic laws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market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namely labor cost control, salary and bargaining power, club community assets for football players. A player transferable transaction is labeled by the feature of speculation rather than a kind of marketing manner for ensuring the ability to pay and repay. The professional football club is 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entity that attracts speculative capital in the market,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players' labor capital will produc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s the trustee of community assets, club investors can make a clear commitment to the fans to ensure that the club's performance in the games sets the priority and to win the positive social value.

**Key words:** professional football;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market law

我国在以商业发展为本质的职业体育领域, 与欧美发达国家职业体育还存在巨大差距, 职业体育的“跛脚”造成我国竞技体育大而不强的现实处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学界对于职业体育市场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规律认识不深, 对于职业体育领域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套上“紧箍咒”。原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谢琼桓<sup>[1]</sup>认为: “随着国门的打开, 信息的快速流动, 人们终于逐步认识到体育技术、体育服务和一些延伸的产品确实具有商品价值。高水平运动员的

流动有价码, 那是运动技术的价码, 不是卖身, 过去我们的理解偏颇了。”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历史节点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深入理解职业体育市场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规律提供科学研究方法论。

## 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职业足球市场的本质属性

### 1.1 资本运作方面

由于不同运动项目的市场运行体制机制存在较大

收稿日期: 2020-02-22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8CX04021B)。

作者简介: 欧阳勇强(1980-), 男,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学研究。E-mail: ouyangyq@upc.edu.cn

差异，选择职业足球为研究对象，足球运动也是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运动项目。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足球运动不仅在实践层面产生巨大的市场价值和大众吸引力，也是资本积累的典型形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资本家寻求世界顶级职业足球俱乐部控股权，无论是以债务融资的形式，还是以资本注入的形式，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资本家都渴望收购世界顶级职业足球俱乐部。二是电视转播权的激烈竞争，例如英国天空卫视电视台(Sky)和美国 ESPN 等传媒巨头争夺足球市场的电视转播权<sup>[2]</sup>。足球运动誉为世界第一运动，无疑是全球商业竞争和资本投资的最佳可选标的。对于足球运动全产业链的生产者而言，从青年训练计划、足球社区项目到球衣球鞋，都需要将实际开展的足球活动转变为一种赚钱的手段。由于足球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职业足球市场的本质属性与商业实践活动紧密相关，足球产业是一种稀缺的产业类型，是一种全球性的全产业链项目，职业足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扩张和积累商业资本。

### 1.2 剩余价值方面

资本主义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从劳动者提取剩余价值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扩张<sup>[3]</sup>。货币以合同的形式承诺购买劳动力和其他商品，然后再将这些商品组合起来，生产出比最初支出的合同价值更高的商品<sup>[4]</sup>。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所有的价值都是通过商品销售实现，也就是说，商品价值应当以货币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职业足球市场中的商品生产形式，即提供高质量的观赏性体育赛事活动，其使用价值低于生产劳动的总价值。根据雇佣劳动力的价值(按照合同规定)和剩余价值，将转换货币或生产劳动总价值划分为生产利润、银行利息、市场营销和土地或建筑物的租金等<sup>[5]</sup>。就职业足球市场而言，如果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就不会产生利润，这意味着支付给货币资本的市场营销和利息，是由各种方式赞助足球运动的外围产业债务提供，由此实现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盈亏对冲。

诚然，并非所有的劳动力都能在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剩余价值。剥削率是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可变资本)的比值。在职业足球产业链的顶层结构，特别是英超职业足球联赛的剥削率小于零。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利润不等于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价值的衍生品，剩余价值包括与组织相关的现有价值或固定资本，具体包括建筑成本、材料、非生产性劳动力、贷款利息、租金等。利润率指的是剩余价值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的比值。这意味着利润率可能伴随资本市场的内外部环境变化而产生不同的结果<sup>[6]</sup>。困扰资本主义的两

种结果分别是：即使剩余价值保持不变，只要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价值下降，利润也会增加，例如一家资本主义企业降低借贷成本或减少雇佣非生产性劳动力的人数，以及出售资产等。即使当剩余价值增加时，如果固定资本的扩张速度超过从劳动力中提取的剩余价值幅度，利润率也会下降，例如通过强化工作程序来增加对生产性劳动力的利用，日常开支、债务、利息支付、材料成本等方面所吸收的价值则会快速增加<sup>[7]</sup>。在职业足球市场中，不存在固定或可变资本下降问题，产生的剩余价值不会影响资本使用效率。

### 1.3 劳动关系方面

资本主义企业牟取暴利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从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张未兑现的期票，犹如在银行保险库里积满灰尘。在世界五大职业足球联赛(英格兰、西班牙、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中，顶级足球俱乐部产生大量资金流水，营业收入逐年增加，却始终未能将这些收入转化为可持续的利润。英超联赛和德甲联赛是唯一分别创造 1.01 亿欧元和 1.38 亿欧元利润的职业足球联赛<sup>[8]</sup>。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利润属于账面利润，一旦考虑到未偿贷款和债务的利息支付，这些利润就会归零。随着职业足球俱乐部营业收入的增加，将其转化为盈利资本的能力也在减弱。例如，以 1992 年和 2009—2010 赛季为例，净利润水平从 1992 年总收入 16% 的高位，挤压到 2009—2010 赛季 4% 的低位<sup>[9]</sup>。英超联赛陷入历史性的下滑趋势中，即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利润率水平却逐年下降。欧足联指出，在 733 家欧洲足球俱乐部中逾 60% 处于亏损状态，俱乐部通过媒体转播、门票销售、赞助协议和商业活动产生 117 亿欧元的营业收入，对应总支出为 129 亿欧元，各项开销比俱乐部创造的价值要多得多<sup>[9]</sup>。德甲联赛通常对工资成本和门票价格进行严格控制，即便足球场座无虚席，也不可避免陷入俱乐部的债务危机。

由此，职业足球市场不符合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基本定义。这一观点源于将商业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基本逻辑，而忽视对劳资双方进行剩余价值斗争的民主协商机制<sup>[10]</sup>，并区分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论的实践差异。现实情况是职业足球市场从外围的大企业(以赞助、广告和转播权的形式)收取租金，抵消球员工资与比赛运营支出。职业足球市场中的资金循环缺乏有效的控制，表明职业足球市场不适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解释。在英国，大多数足球俱乐部都是由私人股东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然而，这些俱乐部一般不能实现盈利，俱乐部投资人力求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尽管在过去 20 年里营业收入

大幅增长,但职业足球市场的财务状况仍然不稳定,致使欧足联出台《欧足联俱乐部财政公平法案》,以宏观调节失衡的市场定价机制<sup>[1]</sup>。最根本的问题是资本家对劳动力几乎没有定价权,亦即俱乐部投资人对源于球员劳动力所派生的剩余价值缺乏控制权。有学者认为,球迷们观看电视直播和在现场观看比赛仅仅存在体验上的区别<sup>[2]</sup>,两者都是俱乐部产生剩余价值的来源。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球迷们为大型传媒集团生产的媒体商品买单,这些媒体商品是资本家在生产活动中剥削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换言之,这是球迷为俱乐部生产的体育赛事商品支付的现场体验费。

#### 1.4 投机和债务方面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主要是指资本家和劳动力之间的斗争,其次是指相互竞争的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这一制度是建构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阶级斗争关系又是伴随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社会阶层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资本家可以利用失业的威胁,进而提高工作效率,可以对劳动过程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以增加对劳动力的剥削和降低劳动力的支付价格,进而降低劳动力的利润率水平。在职业足球市场中,几乎不存在阶级斗争,生产性劳动只是吸收了所有从外围产业流入足球领域的创造性价值和大部分收入。职业足球俱乐部投资人启动“劳资协商”程序,同时在资本家之间建立良性的竞争机制,实现了整个资本主义阶级集中于控制和剥削劳动力的目标<sup>[3]</sup>。在世界足坛,资本竞争表现为资本家之间的球员雇佣竞争,以支付更高薪水为表现形式,球员和他们的经纪人在每个俱乐部之间挑拨离间。职业足球市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能否从剩余价值中产生利润,进而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依据当今资本主义投机、债务和不稳定的特点与发展趋势,职业足球市场与当前由投机和债务政治经济主导的寄生状态非常契合。

如前所述,职业足球俱乐部得到富有的投资人、全球媒体和企业赞助商的持续支持,他们渴望实现球迷们的消费意愿。每周观看英超足球联赛的平均人数达到 67.5 万,整个赛季超过 2 500 万人到场观看比赛<sup>[4]</sup>。没有什么能够像足球那样持续吸引大众的热情参与。在生活中很少有机会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发出共同的声音,这一聚集效应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加之全球媒体和企业赞助商的推波助澜,使足球成为一个利润丰厚的全球产业门类。2013—2014 年财政年度,世界五大职业足球联赛的收入平均增长 6%,总

收入逾 300 亿欧元<sup>[5]</sup>。这个利润丰厚的世界职业足球市场的核心层是英超联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投资人,他们渴望在足球和企业赞助商、电视转播权交易、球员转会和贷款市场、商品销售、赛季门票等方面获利。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最新的足球财务年度报告,“2009—2010 赛季,英超俱乐部的总营业额达到创纪录的 20.3 亿英镑,2010—2011 赛季将超过 22 亿英镑。”<sup>[6]</sup>尽管市场“热钱”不断涌入,职业足球俱乐部仍深陷债务泥潭。这引发学界深刻反思,换言之,职业足球市场的本质属性是关于投机和债务的政治经济学。

##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职业足球市场基本规律

### 2.1 球员劳动力成本控制

在职业足球市场,球员转会交易是增加收入和导致更大成本支出的主要形式。球员转会交易几乎无法平衡预算支出,更不用说彻底解决俱乐部的盈利问题。这是因为球员转会交易具有投机性的特征,而不是确保偿付能力的一种经营方式。足球俱乐部一般在某些年度能够实现盈利,而在下一个年度则会陷入亏损。例如,埃弗顿足球俱乐部以 2 200 万英镑将球员莱斯科特(Joleon Lescott)卖给曼城俱乐部,曼联俱乐部以 8 000 万英镑将 C 罗(Christian Ronaldo)卖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这两笔交易将 2009—2010 年财政年度潜在的转会市场亏损转为盈余,这只是企业年度报表计算规则的问题。球员转会交易具有投机性和风险性的特征,而寻求转会的球员经纪人所产生的通胀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投机风险,因为保持球员转会的快速运转更符合俱乐部的既得利益,这就是俱乐部间租借球员的费用超过球员转会费的根本原因。以英超联赛为例,在 2007 年的夏季转会窗口,137 笔费用为球员的转会费,这一数字与租借出去的 399 名球员相比显得微不足道<sup>[7]</sup>。截至 2009 年夏季交易结束时,在 550 笔交易中有 192 笔转会费交易记录在案,这意味着俱乐部倾向于更保守的贷款交易,以此限制工资账单的增长。然而,每一笔贷出都必须有一笔贷入,这些贷款在企业中期财务报表中一般会相互抵消。俱乐部普遍采取的财务方法是降低与足球无关的低技能劳动力成本支出。在餐饮、清洁、安全保障和较低预算的广告支出,以及俱乐部本地推广方面,俱乐部普遍采用外包低廉劳动力的方式。

与之对应,使用廉价劳动力无形增加俱乐部面临劳动剥削的法律风险。同时在公众和赞助商眼中,容易产生负面效应,破坏企业品牌的良好形象。职业足球市场从准资本主义向生产性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

中,雇佣廉价劳动力的问题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根源是资本家无法通过“降低工资和转会费”的形式控制球员劳动力支出。也就是说,职业足球市场的投资人(资本家)深谙创造俱乐部盈利的关键所在,是创造更多剩余价值,改变目前剩余价值流向球员雇佣成本的状况,使更多资金流向俱乐部投资人。欧足联最近实施一系列足球改革措施,包括一线球队的 25 名球员限制和财政公平规则。根据《欧洲足联俱乐部财政公平法案》的要求,各俱乐部必须在 2012 年之前建立良性的财务管理制度,使平衡预算成为财务工作准则,而不是以投机和债务为主。为使俱乐部更符合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运行架构,欧足联俱乐部财务控制委员会(CFC)将负责监控各级俱乐部是否遵守新的财政公平规则,该规则通过非盈利的情况下建立可持续的财务发展基础,以防止欧盟俱乐部陷入资本清算的危机。同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明确表示,财政公平的关键是迫使俱乐部用他们自己创造的资源为其商业活动提供资金保障。

换言之,尽管俱乐部享受着来自外部资源、企业赞助商、电视转播权等方面获得的巨额资金支持,但欧足联认为俱乐部生存的根本条件是在俱乐部内部创造盈利的能力。从 2012 年起,各俱乐部将实施以下改革策略:支出与收入相符;按时履行付款义务;为改善青训发展而制定的长期商业计划。不符合欧足联财务控制委员会要求的足球俱乐部,将禁止参加欧洲俱乐部冠军联赛。如果不能控制成本,将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值得注意的是欧足联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欧足联属于欧洲范围内的社会民主政治范畴,其政治经济基础是合理运用更广泛的社会潮流,即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促进生产性资本的发展,从而实现金融资本的收益目标。

原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力求通过监管促进生产性资本的发展,欧足联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财政公平规则”将俱乐部提升为生产性资本的组织架构。对于欧足联来说,投机性债务融资是自由市场的敌人,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规律的应有之义。事实上,欧足联期待建立财政公平规则监管框架,为欧洲职业足球市场环境创建良好的必要条件,体现“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企业的道德观念,即追求生产性而非投机性。职业足球市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时代体育商业化的代名词,现有职业足球市场体制机制与资本主义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核心理念形成对立。正是这种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能力,才是资本主义做大做强的真谛所在。世界足坛有句谚语:“足球不仅仅是一门生意”,欧足联试图将职业足球市场置于纯粹的资

本主义政治经济框架上。要想获得资本家对足球生产的控制权,将足球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日常必需品,存在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包括球员权利、球迷诉求、外部收入的限制性影响,以及职业足球道德层面的制约,所有这些都与足球的政治经济并行,限制俱乐部重新分配剩余价值的权力。

## 2.2 球员工资与议价权

有关球员的贪婪并向俱乐部索要高额年薪的陈词滥调,一直是公共舆论的重要话题,所反映的现象是球员天价年薪问题。从每年的总工资成本看,在 2009—2010 年,切尔西俱乐部支付 1.74 亿英镑的工资,阿森纳俱乐部支付了 1.5 亿英镑,曼联俱乐部则支付了 1.8 亿英镑<sup>[2]</sup>。然而,这些主要数据没有考虑到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力的差异问题,虽然球员工资占上述总支出的大部分比例,但其中也包括非生产性劳动力成本(经理、教练员、临时员工等)。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用以区分球队的工资成本和俱乐部雇佣的大量临时员工的工资成本。“非生产性”是理论范畴,而不是道德声明,并不意味着员工不努力工作,大多数非生产性的员工受制于低报酬的高强度工作,一般没有议价权<sup>[4]</sup>。“非生产性”意味着员工将其劳动权廉价转让给资本家(俱乐部投资人),资本家从现有的收入中支付劳动力价格,然后利用这种劳动权维持俱乐部的正常运转,确保生产性劳动能够创造新的价值。

在资本主义的组织化生产下<sup>[5]</sup>,球员踢球是一种生产性的劳动,足球比赛是球员生产的商品,球迷付钱去看比赛,为俱乐部投资人创造价值,球员从中获得年薪,俱乐部投资人试图保留一个可以转化为利润的剩余价值比率和数量。顶级足球俱乐部以雇佣外籍球员这一“非生产性”劳动力,用来保存或转移现有劳动力价值,亦是非生产性的剩余价值<sup>[6]</sup>。这就是将资本主义企业与其它类型的企业区别定义<sup>[7]</sup>。球员工资冲抵大部分俱乐部球员转会创造的新价值,同时冲抵赞助商和电视转播收入所带来的大部分剩余价值。由此,足球比赛剩余价值的直接收入相当于俱乐部总收入的 1/3<sup>[2]</sup>,相对于足球俱乐部的赞助、财政补贴、赠与等外部收入,这种剩余价值的内部来源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

资本家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是通过系统大幅削减球员工资水平,提高球员的剩余价值比率,增加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确保外部保障性收入,将足球俱乐部打造成吸引市场投机资本的体育娱乐实体,市场竞争力将由球员劳动力资本积累产生。如果外部保障性收入持续增加,就可以冲抵球员工资支出。然而,这种

情况发生越多,越来越多的球员将俱乐部视为出售劳动力的雇主,以及享受与足球无关的品牌租金的媒体偶像,这又带来一种通胀压力,无论俱乐部的收入组合如何,都会提高所有精英俱乐部的平均工资水平。欧足联财政公平规则试图压低足球俱乐部的平均工资水平,贴近资本主义企业的治理架构。为让俱乐部走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他们需要解决球员的权力配置问题,并最大限度削减球员工资水平,这是欧足联财政政策传达的基本信息。英超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斯库达莫尔认为,各俱乐部应该将工资上限设定在营业额的 50%~60%,这将保持顶级足球俱乐部所享有的购买力差距,从而保持顶级足球俱乐部的核心竞争优势<sup>[1]</sup>。

球员工资上限是指球员工资可以自由设定的一种价值度量,球员在英超足球联赛中的劳动力价值无法确定,至少应当体现球员的青训、聘请私人教练的成本。事实上,精英球员的商品价值不可能从工资收入中分离出来,这是历史上精英球员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地位积累的结果。精英球员的退出效应将对俱乐部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其一是在赞助商和媒体眼中沦为劣质俱乐部,其二是来自企业赞助商、商品销售和电视转播权方面的收入大幅下降,而且职业足球联盟作为利益共同体,联盟俱乐部的形象受损会牵连整个联盟的形象建设。另一个欧洲俱乐部将轻轻松松接过英超俱乐部,成为“最伟大的体育娱乐节目”。足球产业是一场可移动的盛宴,以前的职业足球市场核心在意大利,现在的职业足球市场核心在英格兰,未来的焦点在欧洲足球超级联赛。换言之,如果西班牙受到监管,那么德国就会对外开放。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很难将员工的工资水平降到接近真实价值的水平。其中重要原因是,1995 年博斯曼法案赋予了球员自由流动的权利,让球员自由出售自己的劳动力。随后职业体育经纪市场逐步开放,球员经纪人致力于球员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球员提供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议价权向球员的转移不仅提升了精英球员的实际价值,也对球员转会市场的政策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球员议价权仅针对精英球员而言,普通球员的议价权大打折扣,但俱乐部方面如果试图削减工资或设定工资上限,就无法吸引到争夺冠军所必需的球员。

此外,俱乐部支付的平均工资水平,与球员在俱乐部中的地位以及相关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成正比,精英球员的社会地位代表了俱乐部从电视转播权、门票收入中吸引最佳交易的能力。例如,曼联俱乐部在 2009—2010 赛季的电视转播权收入比埃弗顿俱乐部

高出 5 400 万英镑,而在 2010—2011 赛季的联赛中,曼联俱乐部的转播权收入比西汉姆联队高出 1 400 万英镑。有资格进入欧洲冠军联赛的俱乐部可以获得 400 万~2 400 万欧元不等的奖金,这取决于他们的比赛成绩<sup>[18]</sup>。关键是所有这些额外的收入都需要获得最好的精英球员资源。因此,即使不考虑球员与经纪人的议价权,并假设员工的工资可能会大幅削减,任何将其付诸实践的尝试都可能因外部保障性收入的大幅下降而付诸东流,球员工资与俱乐部收入之间呈现非相关性。当我们考虑球迷权力时,以及这种权力如何与持久的道德发展保持一致时,足球俱乐部投资人作为准资本家的性质就变得名正言顺。

### 2.3 俱乐部社区资产问题

足球俱乐部投资人是为拥有俱乐部遗产的球迷寻找“社区资产”的托管人。或者作为社区资产的托管人,俱乐部投资人向球迷做出明确的承诺,将确保俱乐部取得成功放在第一位,利润放在第二位,并赢得正向的社会价值。球迷们对俱乐部投资人施加压力,要求投资人将公共道德付诸实践。职业足球俱乐部作为社区资产的公共属性,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和营造良好的社会团结氛围,在这场盛大的社会聚会和足球比赛日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球迷们知道他们为俱乐部支付了多少钱,他们想把钱花在俱乐部和球场建设上。讽刺的是,球迷协助他们心仪的明星球员在比赛日推销各类足球商品,球迷扮演“非生产性”劳动力的角色,而俱乐部不承担这种“非生产性”劳动力的生产成本。俱乐部也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球迷们希望他们心仪的俱乐部在球员转会市场上始终保持活跃,在经济上致力于引进最好的精英球员。职业足球俱乐部在球迷和社区中的地位,俱乐部在球迷的心目中具有准宗教的社会功能,产生强大的道德规制力量,能够抑制资本主义无节制逐利的丑恶本质。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球员议价权、球迷权利和推动宏观改革的社会力量,与俱乐部投资人逐利的本质形成价值对立。诚然,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中,社会道德的地位至高无上,道德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社会消费品生产的数量、质量和性质(如果一种产品不产生利润,那么就不会作为商品生产形式)。职业足球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资本主义商品,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利润来源,是一种与社会凝聚力紧密联系的道德经济类型,与足球承载的社会道德标杆价值相得益彰。由此可见,职业足球市场是一种不稳定的商品类型,因为社会道德价值观并不能完全支配职业足球市场的发展走向。同时,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迈向资本积累与社会价值的融合发展,即大手笔的

企业资金投入和足球的准宗教社会功能融为一体。俱乐部投资人最合理的承诺，是让球迷们坚信无论发生什么状况，他们心仪的足球俱乐部都会招募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并在球场上尽全力获取比赛胜利，这是作为“社区资产”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社会价值所在。

与此同时，球迷们加入球迷组织，对俱乐部投资人施加道德压力，努力确保足球道德经济的可持续性，同时限制俱乐部提高比赛门票价格。可以说，精英球员和球迷组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对俱乐部成本控制形成巨大的冲击。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统治力量，这种球迷集会充其量不过是对集体努力的浪费，往往是一种原子化和非政治化的日常经历。任何一个球迷网络论坛，人们讨论的核心主题必然是关于资本主义职业足球市场的不稳定状况和资本家未兑现的承诺问题，并持高度怀疑和激进的社会观点。

进入新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产生新的变化，允许资本主义企业通过社会资本与债务融资组合的方式补充发展资金，导致俱乐部投资人顺利以二级资本债券的形式介入俱乐部的控股权，并与银行体制、政府体制与商业媒体形成新的寡头体制。也就是说，俱乐部投资人需要借助足球的社会道德价值建立自己的信用资本，以便获得银行融资的长期通道，不断进行职业足球市场关于投机和债务的循环；政府体制需要借助企业资金和社会资本，发展足球公益事业，建立政府的良好形象；商业媒体掌控着赛事转播权的巨额利益来源，是搭建政府、市场与社会互融互通的桥梁。与新时代社会民主发展趋势一致，欧足联试图打破资本主义企业投机与债务的寡头体制，由此针对俱乐部投资人债务融资与投机的漏洞，出台实施欧足联财政公平规则。

综上所述，通过对资本主义职业足球市场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规律的深入思考，让我们更深入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逐渐衰退的本质。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历史征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打赢中国职业体育高质量转型发展攻坚战。

#### 参考文献：

- [1] 谢琼桓. 体育改革与发展中六个节点述评[J]. 体育学研究, 2018, 1(6): 15.
- [2] JEAN F B, JEAN J 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fessional sport[M]. Cheltenham &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 2015: 34-67, 110-129.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37.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6-78.
- [5] 杨锦英, 肖磊. 超额利润的性质及其对一般利润率的影响——马克思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的扩展[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5): 94-100.
- [6] 裴宏, 李帮喜. 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分配——基于分析马克思主义视角[J]. 当代经济研究, 2014(12): 40-46.
- [7] 户晓坤. 《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的资本逻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前提性批判[J]. 现代哲学, 2012(3): 30-36.
- [8] JOHN N, SCHIMMEL K 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port[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2-32, 45-66.
- [9] 陆森召, 冯维嘉. 英超联赛经营管理模式的现状数据分析[J]. 体育与科学, 2019, 40(2): 75-80.
- [10] 陈人江. 关于李嘉图剩余价值理论的争论与马克思的贡献——基于《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史视角[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5, 31(6): 44-48.
- [11] 张静, 于天然. 《欧洲足联俱乐部财政公平法案》的默顿功能分析及其对中国职业足球的启示[J]. 体育科学, 2017, 37(12): 31-37.
- [12] 魏伟. 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对体育学研究的影响[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 26(6): 493-498.
- [13] 黄璐. 美职篮停摆事件的再思考——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之际[J].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2018, 32(6): 8-14.
- [14] 程恩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4-64.
- [15] 卫兴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M]. 4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88-110.
- [16] 梁树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般原理的基本观点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2-138.
- [17] 沈开艳. 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若干新思考[J]. 上海经济研究, 2010(12): 3-11.
- [18] EVAN W. The business & politics of sports[M]. New York: TBE Press, 2015: 22-34.